壹、前言

教育作爲整體社會制度之一環，很難自外於社會環境而獨自構思其存在之目的。不過就教育所服膺之社會目的而言，有的學者就結構功能論的觀點出發，認爲教育目的旨在促成下一代社會成員習得既存社會的價值規範與行爲模式，以永保社會的和諧發展。但亦有學者從階級衝突的角度出發，認爲教育之目的旨在啓迪批判意識，以促成公義社會的實現。此一教育社會學的批判傳統，晚近雖爲M. Apple、H. Giroux等人大力倡導，而逐漸形成批判性的教育社會學，但是論其根源，卻可上溯至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社會重建論（social reconstructionism）（鍾鴻銘，2008；Brosio, 1991）。社會重建論者對於如何以教育來引導社會改革，容或有不同見解，但以H. Rugg、G. S. Counts、T. Brameld作爲此一學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則爲論者所共同接受（吳俊憲，2006；李涵鈺、陳麗華，2005；鍾鴻銘，2004；Riley, 2007; Stanley, 1981, 1992; Stocco, 1986）。

上述三人之中，Brameld是社會重建論的集大成者；Rugg則是理論與實踐並進，其編著之社會科教科書亦曾發生一定的影響力（鍾鴻銘，2006）。Counts雖爲Rugg同時代之人，然因其批判火力尤甚於Rugg，依代表性而言，更堪作爲社會重建主義的代表，故可稱之爲社會重建主義之父（Stocco, 1986）。Counts的教育批評工作淵源甚早，早在1920年代初期，Counts（1921, 1922a, 1922b）即曾爲文並出書探討美國中等教育隱含的選擇性格，批評美國中等教育的受教機會明顯受到階級、種族等因素的影響。今日教育社會學充滿著階級及社經地位的論述，Counts是最早將此兩種概念引進教育社會學領域的學者之一（Goodenow, 1978）。不久之後，Counts（1927a）又出版一本名爲《教育董事會的社會組成》（*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Boards of Education*）的著作，此著作透過統計分析，說明地方教育董事會成員的社會階級特性。概括而言，在1920年代，Counts的著作

皆以分析影響學校教育之各種政治、經濟因素以及權力團體爲主（Goodenow & Urban, 1977）。美國晚近最著名的教育史學者L. Cremin可說是Counts最出色的學生，在其著作中，Cremin（1964）認爲Counts的教育批判開啓了教育政治學的先河。1932年是1929年經濟危機以來，蕭條最嚴重的一年。同年2月，Counts（1932c）在「進步主義教育協會」（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於馬里蘭州（Maryland）巴爾帝摩（Baltimore）召開的第十二次年會中，發表一篇〈進步主義敢勇於進步嗎？〉（Dare Progressive Education Be Progressive?）的文章。Counts的此次演講是進步主義教育史乃至美國教育史的重大事件，但是它不僅未能取得進一步共識，甚至在進步主義者之間造成更大的分裂，此一事件還被視爲是進步主義邁向終結的前兆（Niece & Viechnicki, 1987）。

同一年內，Counts在不同的教育會議上又宣讀了二篇講稿，分別爲〈透過灌輸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Indoctrination），以及〈自由、文化、社會計劃及領導〉（Freedom, Culture, Social Planning and Leadership）。稍後，這三篇演講稿被彙整成一本名爲《學校敢勇於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嗎？》（*Dare the school build a new social order?*）的小冊子出版。要求教育工作者勇於承擔改造社會的職責乃是此書的主要議題。自此之後，Counts的著作大抵即以社會改革爲核心目標，且將教育當作達成此一目標的重要機制來進行相關學理的論證。本文之目的即在解析Counts的相關教育論述。本文首先敘述Counts的生平，次則探討其教育觀，接著再探討其社會重建論的重要論證，最後則是闡釋其對美國教育及教師的期許，並殿以結論與建議。

貳、Counts的生平

Counts於1889年12月9日出生於距堪薩斯州（Kansas）包德溫（Baldwin）市三哩遠的一座農場，1974年11月10日於伊利諾州（Illinois）的貝勒維爾（Belleville）地區與世長辭。受成長背景影響，Counts對民主有